

第 一 卷

《诗品》叙录

世传《诗品》三卷,南朝梁记室参军钟嵘撰。

钟嵘一生的事迹,并载唐姚思廉《梁书》卷四十九、唐李延寿《南史》卷七十二钟嵘本传,其他史料则湮没无闻。两传实皆后出,所记略有异同,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参照。但是纪载都很简括,语焉不详,这给我们对于钟嵘的生平、思想,特别是他的诗美学思想进行全面而深入考察,增加了不少困难。我们仅能知道:钟嵘(?—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县)人,晋侍中钟雅的七世孙。父蹈,官至南朝齐中军参军。他的先世本土族,钟雅死后,家道衰落。嵘有兄弟三人,并好学有文才。兄岷,字长岳,任府参军建康令^①,著《良吏传》^②十卷。弟屿,字季望,任永嘉(今浙江永嘉县)郡丞,撰《遍略》。南朝齐武帝萧赜永明二年(484),卫将军王俭领国子祭酒。次年,诏立学。时钟嵘为国子生,

①“长岳”,《梁书》作“长岳”,《南史》作“长丘”;今从《梁书》。“建康令”,《梁书》作“建康平”;《南史》作“建康令”;今从《南史》。

②《良吏传》,《梁书》作“良史传”;《南史》作“良吏传”。按《隋书·志·经籍二》、《新唐书·志·艺文》并作《良吏传》十卷,钟岷撰。今从《南史》。《旧唐书·志·经籍上》作“《良史传》十卷同《梁书》”,误。

即出其门下，以优异的成绩博得了王俭的赏识，俭“颇赏接之。”嵘于齐明帝萧鸾建武初为南康王国侍郎，东昏侯宝卷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入梁，为衡阳王宁朔记室，又转晋安王记室，世称“钟记室”。不久，卒于官。

钟嵘的一生，处在南朝中叶齐、梁之际，历时颇为短暂，与刘勰齐名。两人并非诗才，却以撰著见称，取彙当代，泽惠后叶。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著作在同一时代相继问世，互相辉映，彪炳千秋，各以自己的思想力量震撼千古诗坛，都是不朽的命世佳作。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内篇五）云：“《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这就是说，《文心雕龙》为文体通论，故“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诗品》为诗体专论，故“深从六艺”；思深而意远”。魏、晋以降，迄于南朝齐、梁，即《诗品序》所涉，诸家撰著，如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张鹭《文士传》等，多已亡佚，独这两部论著得以流传，历经千载，其势不衰，追踪躋迹，探迹可寻，昭示了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钟嵘一生不以诗咏名家。胡应麟《诗薮·外编·六朝》云：“评诗者，刘勰《雕龙》，钟嵘《诗品》。刘、钟藻鹭，妙有精理，而制作不传。但是钟嵘翰墨，并非无可讽诵。《梁书》、《南史》钟嵘本传并载：“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嵘）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时居士何胤筑室若邪山，山发洪水，湮拔树石，此室独存。元简令嵘作《瑞室颂》，以旌表之，辞甚典丽。按南朝通行文体，《瑞室

颂》当是一篇具有一定艺术特色的文艺著作,否则,史家评论,便不能赞其为“典丽”。可惜这篇著作已经亡佚,我们不能确切睹其风采。但是不难设想,一个人的一生,即便是点滴的艺术实践,也会给他从事理论撰著提供某种艺术经验,化为思想的积淀。《瑞室颂》和《诗品》应是同一时期的著作,而又稍早于《诗品》。《梁书·衡阳嗣王元简传》载 梁武帝萧衍天监三年(504),萧元简袭封衡阳王,出守会稽。元简引嵘为宁朔记室,职掌文翰,作《瑞室颂》,当在此时。《诗品》一书的撰写时间则在十年以后,约当天监后期,这时已经临近钟嵘的晚年。则《瑞室颂》的问世,必然要为后来《诗品》撰著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钟嵘其他撰著,有文献可征者,尚存两则。一是齐明帝萧鸾“躬亲细务”建武初,时钟嵘为南康王国侍郎,乃上书云:“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才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书奏,明帝不恚,斥嵘为“欲断朕机务”^①。一是梁武帝萧衍天监初,虽政权变革,而旧弊未除。嵘上书云:“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纓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虽)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②。梁武帝萧衍诏付尚书执行。以上两书,反映了钟嵘刚直不阿,为政清廉的一贯社会政治理想。而抨击时弊,深中肯綮。文词“典丽”,言简意赅,当与《瑞室颂》同风。综观《诗品》全书,许多震撼人心的诗评及其焕发的诗美学思想,思路严密,妙语连珠,正与其严正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典丽”文风互相表里,一脉相承。

① 《南史·钟嵘传》。

② 并见《梁书》、《南史》钟嵘本传。

世传《诗品》三卷,每卷各有序一篇冠于卷首。《诗品》一书,最早著录唐魏徵《隋书·经籍志》四:“《诗评》三卷,钟嵘撰。或曰《诗品》。”可见“诗品”之名,一开始便有歧义。钟嵘原著,是作“诗品”还是“诗评”已经无可稽考。《梁书·钟嵘传》:“嵘尝品古今五言诗,论其优劣,名为《诗评》。”又《南史·钟嵘传》:“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以上三史,都是唐人撰著,或明或暗地昭示了早期的书名当作“诗评”。私家撰著,如卢照邻《卢升之集·南阳公集序》(照邻字升之)云:“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又唐(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引隋刘善经《四声指归》:“颍川钟嵘之作《诗评》,料简次第,议其工拙。”刘、卢两家并魏徵离钟嵘相去未远,应当能够看到《诗品》原著。但也历经百载,并云“诗评”,是否保留了《诗品》旧题的本来面目,是一个重要关键,值得进一步思考。唐代以降,宋欧阳修《新唐书·志·艺文四》亦著录“钟嵘《诗评》三卷”。元托克托《宋史·志·艺文八》则著录“钟嵘《诗评》一卷。”可见元代以前,史家撰著,统称“诗评”。

宋、元之际,《诗品》书名的更替,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转变时期。赵宋三百年间,“诗品”之名渐起,诸家撰著,呈现了“诗评”和“诗品”两说并存的局面。例如:钟嵘《诗评》云:“灵运诗,其源出于陈思,雅(杂)有景阳之体。”^①谢灵运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钟嵘《诗品》论之最详。^②又“钟嵘《诗品》,以古诗第一,子建次之,此论诚然。”^③即在一书之中,也出现了“诗评”和“诗品”异乎寻常的两名并存的现象,并无严格的区别。宋何汶《竹庄

① 李昉《太平御览·文部·诗类》(卷五百八十六)。

②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

③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诗话》云：“钟嵘《诗品》云：‘古诗眇邈，人代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唱’。”又云：“《诗评》云：‘茂先诗，其源出于王粲’。”《诗评》云：“安仁诗，其源出于仲宣”。这种情况表明，赵宋时代，正是处在《诗品》书名嬗变过程之中，所以‘诗评’和‘诗品’两名并存，互相通用，普遍为士林学子所接受。这一时期，今存世传珍本足可征者，则有宋槧沈氏‘繁露堂’本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祐七年庚申（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文章门·诗品》（卷二十二），或云“山堂考索”；世称“考索本”。明刊诸本，制作日繁，“诗品”之名，已趋统一。于是宋、元以降，“诗品”之名兴起，“诗评”之名遂废。

综观《诗品》书名的嬗变，从南朝梁武帝天监末迄于宋、元之际，历经八百余载，并非一蹴而就。这一嬗变进程，正好说明了《诗品》这部不朽的命世佳作，在漫长的岁月中，获得了历史的认同，找到了它的适当位置。钟嵘《诗品》旧题，或名《诗评》，或名《诗品》，两者并非绝对地不能相容。从总体上、从全书所品百二十二诗家系统把握对象，重在诗‘品’对于一位具体诗家及其诗作进行审美评价，则重在诗‘评’。“品”是序列等第，“评”是判断优劣，两者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从而构建了《诗品》全书的理论体系。所以《诗品》旧题可能正如隋志所载，当初两名并存，唐人选择了“诗评”，宋人则标举“诗品”。倘若在作者钟嵘的笔下仅止“诗评”一端，宋人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根据实现《诗品》书名的变更了。

宋人复归《诗品》书名旧题，不可谓无因。钟嵘《诗品序》自叙云：“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又云：“昔九品论人，《七略》载士。”则钟嵘的本意，是要步士章后尘，完成士章未竟事业，撰著

《诗品》。现存《诗品》三卷,通体在于着眼品第差别,这就是通过对于具体诗家及其诗作的审美评价即‘诗评’,品第诗家,别为三品。则‘诗评’之名,轻重倒置,颇觉相左。《隋书·志·经籍三》著录‘《围棋品》一卷,梁武帝撰。’又《隋书·志·经籍下》著录“《棋评》一卷,梁武帝撰。则‘品’评’重点似有差别。《旧唐书·经籍下》仅存‘《棋评》一卷,梁武帝撰。’史家撰著,遗《棋品》而置《棋评》,与择‘诗评’而弃‘诗品’如出一辙。

六朝时代,品藻人物,蔚成风气,时人称为‘流品’。沈约《宋书·王僧绰传》:“参掌大选,究识流品,谙悉人物,拔才举能,咸得其分。”《隋书·志·经籍二》著录无名氏作者‘《海内士品》一卷’^①当是品藻人物论著。但是品藻人物,仅及士族以及达官显贵。《晋书·刘毅传》:“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又云:“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又《晋书·段灼传》:“(灼)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里。”临去,上表云:“今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这种严酷的政治环境,造就了一代社会风气,影响所及,必然波及到精神文化艺术领域,从魏、晋迄于南朝齐、梁,品第风靡,诸家撰著,相继迭起。有文献可考者,即以《隋志》所载,除上述梁武帝萧衍《围棋品》、《棋评》二种外,尚有无名氏《书品》二卷,范汪等注《棋九品序录》一卷、《棋品》五卷,袁遵撰《棋后九品序》一卷,陆云公撰《棋品序》一卷。稍早于钟嵘的南齐谢赫(479—501),是一位著名画家,早在钟嵘《诗品》问世以前,即已完成了他的著名画论《古画品录》。这部著作将魏、晋迄于南齐计画家二

① 《旧唐书·志·经籍上》著录《海内士品录》二卷魏文章撰;当即隋志著录《海内士品》。《新唐书·志·艺文》著录‘魏文帝《海内四品录》三卷’;‘四品’当为‘士品’之误。

十七人,别为六品,分别加以评论,是为‘画品’之始。又在理论上倡言‘六法论’,开创了绘画理论历史的新局面。《古画品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品第画家和评论画作恰当结合起来,无疑给随后兴起的钟嵘《诗品》开辟了道路。

由此可见,终六朝之世,在精神文化艺术领域日益兴起的品第之风,正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那种根深蒂固,品藻人物风气的曲折的、折光的反映。而‘品’是主潮,所以诸家撰著,多题为“品”。钟嵘《诗品》只不过是这个主潮的一个局部,一个侧面。

《诗品》一书的问世,主观因素和客观条件都已成熟,具有不庸辩驳的历史必然性。很难设想,钟嵘一生颇能自守,在政治思想上一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而在立言大节上却又昧于思考,游离于当代学术思想主潮,撰著题名,独标‘诗评’。即如隋志著录,原著两名并存,似应首先标举“诗品”,其次才是‘诗评’。‘评’是为“品”,品第既定,评在其中。有宋时代,诗话兴起,正是方轨前哲,承袭《诗品》余绪。则宋人复归‘诗品’旧题,非特接触到了南朝时代脉搏,回溯南朝撰著主潮,同时也有自身的需求,实有复归‘诗品’旧题之必要。权衡利弊,这一变革不应视为一般复旧思想的体现,而是合乎规律的继承和必然的发展。”

世传《诗品》三卷的另一个容易引起纷争的问题,就是每卷各有一篇序冠于卷首。这种布局,打破了传统的一书一序通例,一书多序,分别插入其中,冠在卷首。终南朝之世,亦属仅见。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云:“《法言序》旧在卷后,司马公集注,始寘之篇首,诗书之序亦然。”其他撰著,大抵类同此例。《诗品》三序分离,是否钟嵘旧制,已经无可稽考。最早著录《诗品序》者,始见《梁书·钟嵘传》。但是史家撰著,重在史实,对于征引论著,取

舍有别,详略不同。本传所引,仅及《诗品》世传诸本上品序,其他则告阙如,不能据以证明《诗品》原作两序是否存在 或者是三序合一,还是三序分离 推其文义,三序分离,文章显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它的完整性,割裂痕迹,显然可见,有失南朝著作高手驰骋翰墨之旨。再说三序所论,并非各自成体,往往涉及全书,互相交融,不可分离。例如上品序云:“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 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是统领全书的基本指导思想,非只限于上品。又如中品序云:“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论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 矧所寓言,不录存者。”又云:“嵘今所录,止乎五言。”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所论关涉《诗品》全书,亦非限于品第中品诗家。至下品序中,作者钟嵘标举自“陈思赠弟”以降凡二十一家,计上品九人,中品十一人,《诗品》誉为“五言之警策”,是“篇章之珠泽,文彩之邓林”。下品诗家,不能跻此宗流,则下品序又无涉于下品。这种矛盾现象,恰恰证明了三序分离,当是后世好事者所劣作,殊非《诗品》旧制。三序合一,这种矛盾便自然化解,完好无缺。而三序分离,倘从全篇所揭示的诗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整体衡量,其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影响所及,甚至超越了《诗品》书名的更替。因为前者是名,后者为实,是昭示全书重要指导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一篇文章,一本论著,关乎实质性的部分一旦遭到破坏,随意割裂,残缺不全,其严重程度可以想见。

《诗品》世传诸本,仅见清代何文焕辑《历代诗话》本将三序合一,总为一篇。可见在清人的眼里,早有三序割裂之慨 何文焕为清代前期乾隆时代一位大家,该本虽属后出,对《诗品》全书做了不少校正工作,功不可没。这里大胆设想,采取了断然措施,将三序合一,别为一本,可谓慧心独具。但是何氏并未说明原委,

不识所据,疑点犹存,是否恢复了钟嵘《诗品》旧制,仍是一个千古未解之谜,千秋功过,尚待评说。

时间过得愈久,愈是感到这个问题应当引起研究家的关注,实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三序合一,还是三序分离,看来仿佛仅是外在形式问题,似无涉于大局。我所追求的,不是一般地从形式上、从技术上、从文章结构方式上苛求分合,而是更多地关注《诗品》一书撰著的基本指导思想,《诗品序》中所昭示的有关全书诗美学思想的整体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分之则俱伤,合之则尽美。权衡利弊,宁可弃置珍筴,追踪何本,将三序合一。不同之点在于因其篇幅较繁,信息量大,这里三序合一,别为一卷,一则复归全序旧貌,一则平衡全书布局。

《诗品》一书究竟撰写于什么年代,钟嵘在《诗品》中没有明确叙说,《梁书》、《南史》钟嵘本传亦未有明确纪载,但从《诗品序》中可以窥见端倪。《诗品序》云:“昔在贵游,已为称首。”昔在贵游”,所记当指南齐末叶梁武帝萧衍(464—549)即帝位前“竟陵八友”事。《梁书·武帝纪》载梁武帝萧衍少有文才,南齐末,“竟陵(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萧衍)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故云:“昔在贵游。萧衍于南齐和帝宝融中兴二年(502)受禅即帝位,改国号为梁,改元天监(502—519),称梁武帝,故云:“已为称首。”据此可以推断,《诗品》一书的写作年代,当在南梁初叶梁武帝天监中。这是第一层推断,也是按其基本情况粗略的推断。

又《诗品序》云:“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录存者。”则《诗品》全书所品第诗家,大抵盖棺论定,遂成定评,不可移易。《诗品》所评论梁代诗家计十人,其卒年有年代可征者,而

以沈约(441—513)为最晚。《南史·钟嵘传》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南史》所载，给人一种错觉，以为《诗品》之制，仅是作者钟嵘为了发泄私愤，抨击沈约，这就必然损伤了《诗品》这部命世佳作的严肃性及其存在的价值。史载失实，也必然误导信息，使得《诗品》一书遭来了后世学子的种种非议。但也提供了确凿信息，《诗品》一书的写作年代，当在沈约逝世以后，与《诗品序》中所论“不录存者”正相吻合。钟嵘生命短暂，这个时候，亦已临近他的晚年。沈约卒于梁武帝萧衍天监十二年(513)，钟嵘约卒于天监十七年(518)。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诗品》一书写作时间，当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至十七年(513—518)间。这是第二层推断，也是合乎情理的比较接近实际的推断。悠悠岁月，撰此佳作，最长时限，历时五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仅是短暂的一瞬。钟嵘晚年，先后为衡阳王萧元简和西中郎晋安王^①记室。大约《诗品》问世不久，顷之，卒官。”

二

文学历史经验表明，理论的升华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一种合乎规律性的前进发展运动。文艺思想或者美学思想某种理论批评的产生，必然以其丰富的艺术经验作为它的根据，又

① 《梁书·衡阳嗣王元简传》：“衡阳嗣王元简字熙远，高祖四弟畅之子。’畅卒，天监元年，追封衡阳王。’天监三年(504)，元简袭封衡阳王。又《梁书·简文帝纪》：“简文皇帝讳纲字世缵，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天监五年(506)，封晋安王。’天监十七年(518)，征为西中郎将。’太清三年(549)，高祖萧衍崩，即皇帝位，是为梁简文帝。”

反过来推动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这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便不能有效地进行理论创造。《诗品》所品第对象“嵘今所录,止乎五言。”这就是从两汉迄于南朝齐、梁五言诗家及其诗作。五言诗的兴起,可以溯源到西汉初叶。《诗品序》云:“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两汉以降,迄于南朝齐、梁,经历了约六百年之久的漫长岁月,获得了重要发展,直至全面繁荣。西汉初叶,正值封建社会初期,上接以《诗》三百篇为代表的四言体诗“衰世”^①之音,下开唐代近体的新风。作为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这是由四言迈向五言,从古体走向格律的过渡历史形态。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语言的繁衍,语法词汇的构式及其表达方式的日趋复杂和不断更新,强化了艺术手段的丰富表现力,在一定程序上影响了诗吟本体的变革。同时,六朝三百余年间,政权的不断更替,社会的动荡和国土的分裂,造成了众多不安定因素,刺激了人们的思想日趋活跃,又为五言诗的发展和繁荣开辟了道路。

五言的繁荣,给诗学理论和诗美学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同时也给诗学理论和诗美学提出了新的任务。经历了约六百年之久的五言嬗变,诗坛名家,代有颖出,各以自己的艺术才华,丰富了我国古典歌吟的艺术宝库。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必然要在理论上进行总结,从而推动了诗学理论批评和诗美学的发展。建安以还,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张鹭的《文士传》,任昉的《文章缘起》,以及散见其他撰著如葛洪《抱朴子·外篇·钧世》诸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都相继问世了。以上著作,涉文甚广,重点不同,在各自的领域,都是当代命世佳作,但同时也表现出有所不

① 《淮南子·泛论训》:“《诗》、《春秋》,学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

足。刘勰《文心雕龙·序志》做了如下评论：

“详观近代之论文者多矣 至于魏文述《典》，陈思序《书》，
应场《文论》，陆机《文赋》，仲治《流别》，宏范《翰林》，各照
隅隙，鲜观衢路。”

《诗品序》亦云：

“陆机《文赋》，通而无贬。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
《鸿宝》，密而无裁。颜延论文，精而难晓。挚虞《文志》，详
而博瞻，颇曰知言。观斯数家，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
至于谢客集诗，逢诗辄取。张鹭《文士》，逢文即书。诸英
志录，并义在文，曾无品第。”

然而历史的选择显得是多么严酷，经历了若干世纪的大浪淘沙，
这些著作有的已经湮没无闻，有的亦已散佚，仅存片断佚文残
篇。而钟嵘《诗品》经受了千百年来历史的严峻考验，昭示了蕴藏
着的巨大思想力量及其强大生命力，所以能够不朽。

作为整个历史进程的一个光点，一个纪录，以上论著，有必要
进行简要的历史的回顾，作粗略的比较观察。曹丕《典论·论文》
一篇，倡言“文以气为主”，在文艺思想史上，从宏观上把握文学
本体，这是一个新的命题，为后来“文气说”的兴起开辟了道
路。《论文》具体论述了四科八体，这是文体论的滥觞。“诗赋欲
丽”之说，追踪扬雄《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
丽以淫。”集中了、深化了以“丽”为核心的基本美学思想，揭示了
诗吟审美的外部特征，摆脱了儒家学派“诗言志”说的桎梏，是古
典诗歌美学思想的解放。陆机《文赋》进行了十体分类，使得文体
论更趋细致和缜密。“诗缘情而绮靡”。扩大了和深化了“丽”的
具体内涵；“绮”状色彩，“靡”绘声韵，声色并茂，进一步揭示了诗

吟本体的艺术本质及其艺术特征,千百年来,成了诗家吟咏共同的基本艺术追求。《文赋》深刻地论证了诗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对于现实的依赖关系,诗家吟咏的艺术想象和艺术构思,在更高层次上把握诗吟过程的创造艺术规律,超越前驱,在有晋诸家,独树一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足之处在于:“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①但是《文赋》一篇,以诗的语言具体描述了诗、文本体的复杂创造过程,把握语言载体的利弊得失,在文艺思想史上做了开拓性的探索,有不庸忽视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挚虞《文章流别论》是文艺思想史上第一部文体专论。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挚太常集》题辞云:“《流别》旷论,穷神尽理。刘勰《雕龙》,钟嵘《诗品》,缘此起义,评论日多矣。”昭示了《文章流别论》和后起的南朝撰著之间的渊源关系。李充《翰林论》也是属于文体专论一类,杂有诗家评论,今存佚文片断,吉光片羽,烛照后叶,颇为后之作者所称道。例如:《诗品》评晋黄门郎潘岳云:“《翰林》叹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被之有绡縠’。”^②又佚文云:“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③词意典丽,用语警绝,常发思想的闪光,窥其全豹,足与他的前辈曹丕《典论》、陆机《文赋》相比肩。至张鹭《文士传》,则是属于作家专论一类。从今存佚文可以推断,原作广采博搜,杂以遗闻轶事,规模宏伟,篇什浩繁,在文艺思想史上开拓了一个新领域。魏、晋以降,纪载和评介人物的各种论著如“别传”、“名士传”之类,相继

①刘勰《文心雕龙·总术》。

②李充《翰林论》佚文:“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縠。”并见《初学记》二十一,《太平御览》五百九十七,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五十四。

③李充《翰林论》佚文,见《太平御览》五百九十四。

蜂起,《文士传》则以评介文士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开创了诗家评传的新纪元。

另有任昉《文章缘起》,一名《文章始》,则是最早探索文章源流的理论专著。今存《文章缘起·序》云:“自秦、汉以来,圣君贤士,沿著为文章名之始。”^①宋王得臣《麈史·论文》亦云:“梁任昉集秦、汉以来文章名之始,目曰《文章缘起》。自诗、赋、《离骚》至于势,约八十五题,可谓博矣。”可惜这部著作,唐代以前,早已亡佚,不能窥见它的本来面目。仅见《新唐书·志·艺文》著录书目《注》云:“张绩补。”既名为“补”,张绩应当能够看到原作残卷,保存了原作的某些旧貌。可以设想,从历史的跨度考察文学源流,对于探索诗吟本体的发展及其继承关系,《文章缘起》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魏、晋迄于南朝齐、梁,诸家撰著,相继迭起,按其内容,按其所研究对象,旨要有别,重点不同,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作家作品论,一是文章源流论。这就是从曹丕《典论·论文》迄于任昉《文章缘起》,走了一条由“泛论”到“专论”的道路,而日臻成熟。应当怎样把握这一嬗变的动因及其重要历史意义?古典文艺理论批评或者古典美学,作为整个精神生产的一个特定领域,没有也不可能凭空创造。文艺思想史上每一部佳作的问世,都是由它的作者从先驱手上接过思想的火炬,以兹作为思想资料,做为一个出发点,重新加以创造,然后再继续传递下去,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这是一种规律性的前进发展运动。钟嵘《诗品》的问世,正是处在南朝齐、梁之际发展进程之中,其主要特征,则表现为将以上两个分支熔于一炉,将品第

^①载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任彦升集》。任昉字彦升。

诗家和评论诗作与探源索流密切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从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就是诗体专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是诗体专论之集大成者。

纵观这一时期文学历史的变革,在我们眼前便展现了两幅蔚为壮观的图景。一幅是五言诗的发生、发展、直至繁荣的全景图,一幅是与之相辅并行的理论撰著的相继迭起。这两幅图景互相推移,互相辉映,《诗品》一书的问世,正是处在两个分支的交汇点上,为诗体专论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文理》云:“《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勤为成书之初祖也。”就《诗品》来说,品第诗家,探源索流,鉴裁流别,诸方视角水乳交融,化为一体。所品第对象,不落窠臼,不囿藩篱,往往能够时发新意,妙语警绝。全书纵横交错,其视野之广阔,论证之缜密,在当世具体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是无与伦比的。《诗品》论诗的一个主要特点,表现为专擅从宏观方面进行比较观察。对于具体诗家及其诗作,又善于从微观方面把握具体特征。百人百面,务去雷同。例如评汉班婕妤诗云:“《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又评秦嘉妻徐淑诗云:“文亦凄怨。”两汉四百年间,“为五言者不过数家,而妇人居二。徐淑叙别之作,亚于《团扇》矣。”以上所论,词意婉洽,虽“怨”亦略不尽同,深刻地揭示了女性诗吟的某些特征,在文艺思想史上揭开了女性诗吟进入诗评领域的新篇章。

《诗品》一书作为古代文艺思想史上仅有的一部诗体专论,不仅是理论批评和美学论著的一部杰作,而且具有早期断代文艺思想史的性质。这部杰作的问世,标志着自魏、晋以降绵延约三百年之久的“泛论”时代的结束,专论时代的开始,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三

为什么南朝齐、梁之际,五言诗吟和理论撰著同时获得了蓬勃发展,出现了全面繁荣的局面?一方面是诗吟本体和理论批评自身的矛盾运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又是整个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制约着精神生产领域的产物。前者是主观条件,以上所论,其意义和作用正在于此。后者是客观因素,是推动诗吟本体和理论批评全面繁荣的外部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但是并不是说一个时代的精神生产必然要与物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同步前进,恰恰相反,常常表现为不平衡的发展。

六朝时代,是一个社会历史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众所周知,两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封建王朝。降及六朝,政权的频繁更替,国土的分裂,社会的长期动乱,又经历了北方异族入侵,战乱不绝等重大历史事变,使得人口大量减少,两汉时代积聚起来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延续了约四百年之久。如果说两汉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第一次高峰期,那么,六朝时代则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第一次低谷期。史载:东汉末叶,兴平元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①降及建安,社会状况更趋恶化。“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②有晋时代所承袭下来的遗产,则是举国荒芜,满目疮痍。“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盈

^① 以上并见陈寿《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①又《晋书·挚虞传》:“及京洛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广大人民长时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惨不忍闻,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又曹操《蒿里行》:“铠甲生虱虱,百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粲《七哀诗》:“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些史诗般的诗句,读之“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及其时代悲剧,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然而正是这一历史条件,转化成了艺术生产的动因,刺激了整个一代五言诗的繁荣,促进了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批评和古典美学的蓬勃发展。这些看起来仿佛是矛盾现象,实则表现为规律性的必然的发展。这就是中外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是一种规律性的前进发展运动。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问题正是在于:一切事物的运动是矛盾运动,有了矛盾,要求统一,才能运动。但如果统一就意味着停止,那就必然长期处于静止状态,运动也就停止。所以一个矛盾统一了,必然又有新的矛盾产生,继续推动事物的发展。矛盾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矛盾是永恒的,统一是短暂的。事物的矛盾运动昭示了一个时代的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没有也不可能同步前进,从宏观上、从总体上把握两者之间的进程,则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的绝对的。平衡是短暂的,不平衡是永恒的;而表现为规律性的必然的发展。

六朝时代,长时期的多种矛盾汇集,纵横交错,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其实际水平远比两汉时期低下得多,这是一个历

^①房玄龄《晋书·食货志》。